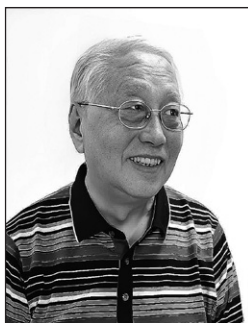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与我国的计算机事业结缘一生

○ 华平澜（1965 届自控）



华平澜
学长

我生于1942年，江苏无锡人，出生在一个工程师家庭。哥哥华山立（无线电系4字班）、堂哥华旭旦（自动控制系9字班）都是60年代清华校友。1959年填报高考志愿前夕，堂哥与我长谈一夜。我了解到自动控制专业和飞行器、导弹、卫星都有关系，第二天就把“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”填写为第一志愿。没想到这一落笔，竟使我与计算机结缘一生。

当时我对计算机几乎一无所知。在自控系学习三年后，我被分配到计算机专业。我知道新中国要想赶超世界科技一流水平，必须研发、应用计算机。1964年下半年，我们自505班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——参加研制112型全晶体管电子数字计算机。这就是我们的毕业设计。真刀真枪，压力很大！我是运算控制组组长，在做8位模型调试时24小时查看、记录机器运行情况，经常一个人在机房通宵值班，整夜不睡。每个同学都加班加点，争分夺秒，你追我赶，那种生龙活虎的景象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奋。在黎达、朱家维等

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们学到了完成一项科研任务的流程与规律，学到了克服困难、百折不挠的清华精神，也培养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和组织协调的工作能力。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毕业设计，我们自505班被评为1965年度“四好”毕业班。112机小组被评为优秀毕业设计小组。我也获评优良毕业生。

1965年毕业后我师从李三立老师读研究生，和师生们一起完成112机的收尾任务。1965年底至1966年初，首届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化工学院举行，我们的展台在一进门很显眼的位置。展览选用的112机的照片有一半都是我拍的，它们记录着112机研制、组装、调试的各个瞬间。观看了112机的演示，周恩来总理、朱德委员长十分欣喜，大加赞赏。美国计算机高级专家代表团也给予好评。可以说，112机对全国高校、科技界都产生很好的影响。清华大学六年的培养教育，特别是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，对我一生的事业影响很大。我特别怀念和老师、同学、工人师傅们一起研发112机的日子，那是我一生工作的起点。

1970年，我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三厂（后来的北京计算机三厂）做技术员。不久，我被任命为军工排排长，管理十几个人。面对“文革”错综复杂的派性，如何团结职工，完成生产任务？清华的“双肩挑”培养发挥了作用。我找每个职工谈心，耐心沟通，求同存异，打造一个团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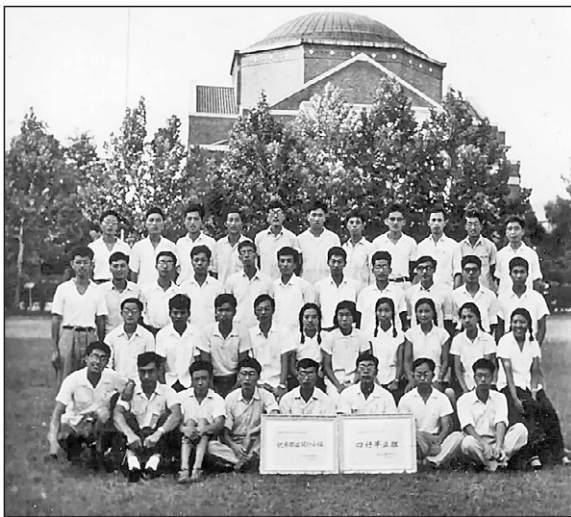
合作的集体。1973年，第四机械工业部下达了DJS100系列小型集成电路计算机系列的研制生产任务。第一个机型由清华大学设计研制，无线电三厂负责生产样机。我是联合设计组副组长，主管样机的研制生产，清华、工厂两头跑，一年多几乎没有休息日。一年两个月，DJS100系列的第一台样机DJS130机在三厂诞生，在清华通过了四机部鉴定。这么快的速度，大家都说是一个奇迹。DJS100系列机各型号共生产了1000多台，是1956年至改革开放前产量和应用最多的机型，为建立、发展我国计算机产业，推动国产计算机的应用、计算机专业的成长及人才培养，立下了功勋。它接近美国PDP-11系列、NOVA系列的水平，而且百分之百国产。DJS130机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，140机获得国防工办新产品一等奖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主持的国家计委科技攻关项目486/EISA高档微机及典型应

用系统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、新产品一等奖。在我的参与下，计算机三厂引进了第一条计算机生产线。从单台少量生产到流水线规模生产，从小型计算机到微机以及微机批量生产……我亲身经历了北京市乃至全国计算机产业艰辛的创业历程。国产微机迅速推广到国防部门、高校、科研单位、厂矿企业，各行各业插上信息化的翅膀，腾飞得更高更快更强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信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新兴产业中最活跃、影响最广泛的生力军。然而计算机在我国还很不普及，大多数人对信息技术仍不了解。中央和北京市共同组建了北京电子振兴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电子和信息事业。我从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调来担任副总工程师，开始推动信息技术在北京各行业的应用。我们小组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，包括为企业争取银行贷款、财政贴息，发动各行业企业应用信息技术。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应该率先垂范。我们与人事局、组织部协调，推行政务信息化，对公务员进行信息技术应用培训，考核上岗，见效较大。我还组织编写过《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》等教材。

面向21世纪，作为全国首善之区的北京面临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挑战。首都在经济上应发展知识经济，打造一流竞争力和生活质量。其中，信息化将起到无可替代的带动作用。建设信息社会，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大战略。我在担任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期间，提出“数字北京”这个战略口号和奋斗目标，组织过多项北京市信息化规



自505班毕业合影，该班获“四好毕业班”荣誉称号，112机小组获“优秀毕业设计小组”表彰

划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实施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“数字奥运”成为一大亮点。这是“奥运战略”与“数字北京”的结合，凝聚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和汗水。北京市的信息化综合水平一直保持全国第一。

2002年起，我开始担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、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等职，为促进国产软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完善奔走呼吁，在政府与企业、国内外

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。在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期间，我为北京市经济科技发展提供6个提案，其中3个获得优秀提案奖。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体会到，具体的知识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，而方法、态度、价值观对一个人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。母校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，还有对待事业与人生的积极严肃的态度以及局部服从全局、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念。

想念 46 年前在静斋的日子

○巴勃罗·罗维塔（1977级计算机）



罗维塔学长在智利参加“当代中国与世界——中拉智库对话会”（2019年）

我是在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，并在1982年7月毕业拿到了工学学士学位。我的老家在南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，据说是世界上离北京最远的首都之一。我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进入清华大学的乌拉圭人。

要说起当时刚20岁的我怎么从南半球抵达北半球、从西方来到东方，需要很长、很复杂的解释。因此我就先简单地来回答这个问题：

我父亲比森特·罗维塔是一位乌拉圭的老共产党员，他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

到20世纪50年代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他与当时的“国际书店”（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）这一机构建立了联系，并在他开设的乌拉圭书店发行来自中国的西班牙语的杂志和图书。因为这种经历，父亲曾多次应邀访华，并有幸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。

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我从小就与中国“相识”。我的童年读物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故事书。我至今记得《今日中国》杂志上那些图片带给我的震撼。父亲第一次去中国时，我才八岁。他带回来很多礼物，有茉莉花茶、丝绸、檀香扇等，还有一盏红灯笼，灯笼周围放满了关于中国的图书和报刊。慢慢长大后，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书籍，逐渐了解到鲁迅、巴金、老舍和茅盾等作家，还有齐白石、徐悲鸿等画家。通过父亲书店里出售的汉语教材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神秘的汉字。再后来，我成为父亲的助手，协助他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。

1975年7月，父母应邀来华在外文出